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 路径选择的方法论*

胡相峰 赵国付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文化的有效对接与融合,持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促进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凸显文化价值取向的契合点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的基本方法,融民族文化精华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的根本方法,理论家与民众的文化沟通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的重要方法,思维方式的对接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方法论的内在要求,语言的文化转换及其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方法论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民族文化 思维方式

作者简介:胡相峰(1957-),淮阴师范学院校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淮安 223300);赵国付(1975-),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江苏淮安 223300)。

马克思主义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实现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化。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其价值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上,必须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资源进行对话、沟通、交融,否则就难以得到中国人心理、思想上的深层次认同。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选择民族文化路径,才能获得本土文化的支撑,从而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选择民族文化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如此方能事半功倍。

一、凸显文化价值取向的契合点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 路径选择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文化,都有自己鲜明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在很多方面具有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民众文化认同的内在根据,凸显文化价值取向的契合点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的基本方法。

1. 小康、大同理想生活追求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充分体现了小康、大同的思想。《诗·大雅·民劳》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郑玄笺曰:康,安也。《晋书·孙楚传》云: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郁达夫在《池桂花》中指出:“家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10JJD710067)的研究成果。

里虽称不得富有，可也是小康之家。”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康生活是一种人民安居乐业的图景。大同思想所表达的是高于小康的生活愿景和追求（参阅《礼记·大同》篇），它批判人与人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希望建立财产公有、没有战争、平等和谐的社会，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康、大同思想虽然立足于抽象的伦理道德原则，其科学理性欠缺，具有空想性，但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价值取向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它既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必然性，又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暂时性，以社会发展规律为依据，主张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建立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没有剥削、压迫、奴役的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社会。中国民族文化构想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低级阶段）理想生活模式，存在着许多的区别甚至是本质的区别，但它们都是为解决现实世界的弊端而提出的理想社会生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必然诉求，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是中国文化中的大同构想，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模式，都是基于完善人性而对人类理想生存空间所做的设计和构想，对现在的人类来说，都有其合理的内核，凸显这种内在价值取向的契合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大众化的必然要求和成功奥妙。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性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认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2. 人本民本思想与群众史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的契合

中华民族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本民本思想，人是中华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学的重要出发点和价值指向。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孟子·离娄上》），“仁也，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可见，儒家仁学在于成人，强调人的重要性。《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由此可知，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中，人最为天下贵，人民的地位至关重要。固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民本思想与今天的以人为本在内涵上不完全一致，但它定然是今天以人为本思想的逻辑演绎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群众史观，强调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更强调，人的根本在于人的自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以社会发展为基础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理想。《共产党宣言》强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由此可见，虽然马克思主义远远超越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人本民本思想，但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人本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契合，是显而易见的。

先进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凸显契合点，注重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背景理解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毛泽东指出：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③。邓小平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强调办任何事情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江泽民强调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胡锦涛则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出：我们只有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能把我们放在心上，我们只有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能把我们当亲人。应该说，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本、民本思想融会贯通，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人本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契合点的彰显，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2页。

3. 义利取向上的契合

义利之辩一直是中国伦理思想的重要主题，但义利统一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孟子强调义利兼顾，二者不可得兼，舍利而取义，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认为，‘好义’和‘欲利’都是人的需要，“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欲，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大略》）孔子强调以“义”节“利”，放于利而行，则多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墨家贵“义”又尚“利”，坚持“利人”、“利天下”的统一，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宋代李觏强调“利欲可言”、“循公不私”，王安石认为，“为人”与“为己”是统一的，利己和利天下的统一才是仁义之道。陈亮指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止斋文集·答陈同甫》）不难理解，中华民族文化在根本上强调的是义与利的统一。

我国民族文化崇尚义利统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又是如何看待义利关系的呢？马克思、恩格斯曾强调：“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①王泽应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总体上保持一种辩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既不赞同道义论立场，也不一般地认同功利论的观点，而是主张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把利益与道德结合起来，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整体利益基础上实现道义论与功利论的有机统一。”^②我们认为，这一理解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义利取向的根本特点。

以上可以看出，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在义利伦理价值取向方面具有一致性。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中注重凸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在义利取向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可接受性，促进了大众化的实现。毛泽东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③毛泽东强调了我们只有在尽必要的义务的情况下，才能享受必要的利益，彰显了义利的统一。邓小平同样坚持义利双顾，他说：“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④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民族文化在价值取向方面具有多维的契合性，凸显这种契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的基本方法。

二、融民族文化精华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的根本方法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融民族文化精华的理论创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只有吸纳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创新成果才能更好地为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认同、所信仰。

1.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内在要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65页。

② 王泽应：《论马克思恩格斯义利学说的性质和基本特征》，载《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4期。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说过：“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①这里毛泽东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的内在实践要求。

时代的发展，社会实践的发展既不断地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又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源，准备充分的条件。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角度看，只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理论的新期待，才能有助于人民群众释疑解惑，马克思主义也才能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和认同。

2. 理论创新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民族文化底蕴丰厚，多姿多彩，但同时也是精华与糟粕并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民族文化中的积极成分、精华部分融入理论创新的成果之中，并用民族文化的展示方式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出来，以揭示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这样一种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创新成果，势必容易为大众所接受。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体现在五千年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衔接、相互贯通和内在结合，从而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体现文化传承和理论创新的高度统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与追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设计，对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整体把握以及渐进式改革思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必须与社会的承受程度相适应的思想等，更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平等、讲求适度、整体和谐等思想的精华。总之，民族文化精华的理论创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为人们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创新，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化的精华基础之上，通过融合民族文化的精华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的根本方法。

三、理论家与民众的文化沟通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的重要方法

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大众化，必须走向大众，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进程中要坚持雅俗共赏和通俗化，促成精英文化与民众文化的沟通，避免理论家和民众的隔膜，从而促进理论家与民众文化价值理念的趋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1. 培养高水平的理论家是沟通的基础和前提

高水平的理论家是与民众文化沟通的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非常注重培养高水平的理论家。恩格斯在他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曾规定，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条件之一就是“具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活力”^②，理论家行动的一切动力，只有通过他的头脑，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44页。

转变为他们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们行动起来,从而形成具有感觉、思想、意志的理论教育工作者。列宁强调,一定要加强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家和宣传员,以促进理论家与民众的沟通。

中国共产党同样重视培养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在共产党创立之前,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为培养理论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党把培养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强调:“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①。党的十七大明确要求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诠释了培养高水平理论家的时代诉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只是少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而是一个包括这些杰出代表的广泛群体。这个群体既精通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又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并且能够坚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是有所作为和创新的践行者、研究者和宣传者,他们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重大社会实践和重大理论问题。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当是一个数量更大、质量更高、更富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群体,这个群体是与民众文化沟通的前提条件。

2. 注重构建理论家与民众文化沟通的机制

培养优秀的理论家不是目的,目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价值理念输送给广大人民群众,用科学理论“掌握群众”,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继而实现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转化。

首先,确立沟通理念。树立沟通理念是理论家与民众沟通的前提,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理论家要确立自觉与民众沟通的理念、责任意识、使命意识,这是沟通的先决条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种政治要求、道德要求。

其次,搭建沟通平台,创新沟通载体。理论家与民众沟通要搭建合适的沟通平台,创建丰富的沟通载体。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中,市民讲坛、圆桌会议、读书节、文化节、媒体宣传、专家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等成为推动理论家与民众沟通的有效平台。报刊、书籍、传媒、建筑物等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载体。

最后,提供沟通制度保障,实现制度化和常态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制度建设是保障。比较健全的领导制度、监督机制、激励机制、考核评估机制、奖惩机制资金保障机制等,是推动和保证理论家与民众有效沟通的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中,十分注重理论家与民众沟通的机制建设,不断拓展沟通平台、创新沟通载体,有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3. 增强理论家与民众文化沟通的责任意识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熟悉、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把自己的理论和民众有效地沟通起来,让民众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真谛。就像毛泽东所说:“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②为此,需要理论家树立强烈责任意识,责任意识是推动理论家与民众文化沟通的内驱力。

责任意识要求理论家不断地把握民众的需求和期待。每个时代的民众总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问题和特殊需求,关照和解决民众问题和需要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也是与民众进行文化沟通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1页。

的过程。理论家要关注现实,善于发现和思考反映时代发展的根本问题,并把此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思考。在此基础上,走进大众生活,通过与民众的有效文化沟通,使民众成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①,以鲜活的姿态和强大的理论力量赢得大众。同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沟通要求民众积极主动地表明自己的需求和期待。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把民众的文化诉求真正地纳入实践的范畴之中,要以哲学启迪和引导,从而促进理论家和民众的有效文化沟通。

总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是理论家与民众的一种文化沟通的双向互动的过程,这种互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路径选择的重要方法。

四、思维方式的对接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方法论的内在要求

思维即思考的维度,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但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每一思维都有不同于其他思维的根本特点,从而构成独特的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即思维方式。任何一种思维方式都有其优点和局限,中华民族文化蕴涵的思维方式也是如此。但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角度看,只有与民族文化蕴涵的思维方式对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更好地推进和实现。

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文化蕴涵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内在地包含着与这一思维方式适应、对接的要求。

1. 实用理性见长的思维特征

中华民族的思维并不排斥思辨性,但更以实用理性见长。以实用理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高度关注现实的、此岸的价值,以解决社会、人生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执著于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问题的研究。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实行”,对抽象的思辨不感兴趣,具有鲜明的务实性、戒空谈的经世致用的特点。实用理性不只强调经世致用,而且强调眼见为实,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果检验认识、行动的正确、合理与否。墨家的代表人物墨翟强调“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这种实用理性广泛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影响科学技术发展走向。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久远,绵延至今,百姓“日用而不知”已成为百姓信息选择、过滤的重要机制。

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同民族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与中华民族实用理性相对接的理论成果。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中,也高度重视与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对接,注重用执政绩效来赢得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善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实表明,理论建构、理论宣传教育注重坚持与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对接,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的重要方法。

2. 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

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与天的关系的问题,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的含义是丰富的,因此天人合一也有不同层面的意涵。“天”作为化生万物的本源,人作为天之造化之物,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天共通、共生共长、和谐相处。“天”作为认识对象,“人”作为认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识主体，天人合一就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相互依存、相互包含，人则在与自然万物的交融中感受、领悟自然万物。天作为人格化、有德性的实体，它是一切社会法则与价值的来源，天人合一就是天道法则与人道法则相协调相一致，就是天道支配人道，人道服从天道，人事若违背天道则会受到天的干预。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把民意视为天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外，“天”作为人事不能及的事情的终极原因，指的是“天命”、“命数”，天人合一就是天人感应，天人共运，人能以其至诚求得天助。“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天人合一思维是一种整体思维，也是一种和谐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中国文化蕴涵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话语建构，都高度重视与民族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对接。毛泽东对愚公移山精神的倡导，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观，江泽民对和而不同思想的弘扬，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建设思想特别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思想，都彰显出了这一特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强调人道服从天道、彰显天的德性的思维更是不胜枚举，如青松精神、梅花精神、荷花精神、钉子精神、螺丝钉精神等等。应该说，这种思维方式的对接极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可接受度，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种思维方式的对接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的重要方法论。

3. 灵活变通的思维方式

灵活变通是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重要思维方式，由来已久。灵活变通的思维，是以变化自己为路径，从而达到通向成功目的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思维方式、中庸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拒绝僵化的思维方式、拒绝固执的思维方式。它并非主张、崇尚圆滑世故，在本质上，它是一种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充满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灵活变通不只是古代思想家们倡导的思想，不只是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思想，更是广泛渗透在社会生活中的朝野上下共享的思维方式，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注重与中华民族变通思维方式的对接，取得了巨大成效。无论是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邓小平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论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还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思想，以及“一国两制”构想；无论是江泽民关于新的社会阶层的思想，还是胡锦涛的和平发展的思想，都体现了灵活变通的思维。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都深深蕴涵着灵活变通的思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的这一选择，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程度。

五、语言的文化转换及其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方法论的必然要求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成果。一般来说，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语言中渗透着民族情感、民族文化和民族自尊等民族心理深层的民族性内容。

语言与文化二者互相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变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它记录、反映、表现文化信息，在文化传承和传播过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文化是语言的内容与底蕴，它赋予语言以丰富、深厚的内涵与旺盛的活力，是语言发展的内驱力。所以，没有文化，语言将不复存在，正如萨丕尔所说：“语言有一个底座。……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

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①所以，每一种语言都蕴涵着文化的意蕴，是文化的一面镜子。

既然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载体和中国语言（汉语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语言）背后的民族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必定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对接、趋同和融合的过程。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要想真正地实现大众化，必须实现语言的文化转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文化意蕴深，一般民众不易懂。大众不是理论家，由于受知识储备和理解力的限制，难以全面准确把握深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这就要求实现语言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也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语言载体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用平实质朴的语言表达深邃的理论，以适合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能力和思维习惯，从而彰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文化要求。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本质上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具体化、形象化和通俗化，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在这方面，毛泽东、邓小平的语言堪称典范。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等等。

总而言之，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载体与中国语言有较大差别，语言结构和语言文化背景不同，其所彰显的文化意蕴有别。马克思主义语言载体如何转化为中国语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步。语言的文化转换不仅仅是简单的翻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转化是一种文化的转换，把马克思主义语言载体中的文化意蕴完整地再现于中国语言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是化“文化”，而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

当然，即便是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实现大众化也有一个语言转换的问题，语言的文化转换及其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选择对思想理论和宣传教育工作者提出的客观要求。

总之，遵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的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成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的方法论问题上，我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方面和环节都做得很好。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持续推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持续推进，必须继续坚持民族文化路径选择，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的方法论。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 [2] 赵洪恩、李宝席：《中国传统文化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 [3] 黄长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场域与路径选择》，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 [4] 王国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探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 [5] 周中之：《民族形式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

（编辑：汪世锦）

①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8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4页。